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從「戰爭的記憶」到「記憶的戰爭」：宋澤萊、陳映真與目取真俊的二戰記憶書寫

From War Memories to Memory Wars: Literary Representations of Memories of World War II in Taiwan and Okinawa

doi:10.6752/JCS.201109_(12).0002

文化研究, (12), 2011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2), 2011

作者/Author：朱惠足(Huei-Chu Chu)

頁數/Page：13-4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1/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109_\(12\).0002](http://dx.doi.org/10.6752/JCS.201109_(12).000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From War Memories to Memory Wars:
Literary Representations of Memories of World War II
in Taiwan and Okinawa

Huei-Chu Chu

從「戰爭的記憶」到「記憶的戰爭」：
宋澤萊、陳映真與目取真俊的二戰記憶書寫

朱惠足

誌謝：兩位審查的提問與建議促使筆者進一步釐清問題意識以及台灣與沖繩的比較架構，僅在此表達謝意。另外也要感謝助理雅菁協助蒐集資料、論文初稿（發表於中興大學「跨國流動與文化再現」國際工作坊，2010年9月10日）對談人何義麟老師提供寶貴意見。本文為筆者主持的國科會整合型計畫「跨國流動與文化再現：以台灣、亞洲與全球化為思考架構」之兩年期子計畫「後殖民記憶與再現：戰後台灣與沖繩小說中的日美經驗」(NSC98-2420-H-005-003-MY2)第一年的部分研究成果。

朱惠足，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電子信箱：hueichu@gmail.com

摘要

本文以宋澤萊〈最後的一場戰爭〉(1976)、陳映真〈忠孝公園〉(2001)與目取真俊〈水滴〉(1997)三篇小說中的二戰記憶書寫為題材，討論台灣與沖繩作家各自以何種立場介入東亞地區戰爭責任與戰後責任問題的爭議。本文主要探討的問題為：三篇小說當中的戰爭記憶書寫，分別呈現台灣與沖繩在戰爭與戰後責任議題上的何種歷史困境？與兩地在戰後的國族身分議題呈現何種交錯與糾葛？藉由對這些問題的對照討論，本文試圖思考台灣與沖繩作為東亞地區的「非國家」，如何建立具體連帶關係，共同抵抗以「國族」為名的戰爭與「戰後」暴力。

將三篇小說放置於台灣與沖繩各自的歷史脈絡下，本文觀察到原台灣人日本兵與沖繩居民在與日本的戰爭與戰後責任爭議中，都必須強調自己在戰爭期間如何「作為日本人而戰」，使得他們在二戰期間身體受苦的戰爭體驗與記憶，面臨被日本國族敘事收編的危機。本文最後提出，原台灣人日本兵與沖繩居民作為國族身分「矛盾」與「錯亂」之歷史主體，其存在本身其實已經擾亂了「身體」、「國族」與「戰爭」的單一對應關係與邏輯，將「作為日本人而戰」的「身體」加以問題化，多重地挑戰著東亞的國族戰爭敘事與記憶政治學。同時，這些「非國家」身體挑戰東亞國族敘事的歷史能動性，也開啓了戰前被迫「作為日本人而戰」的原台灣人日本兵、戰後成為美軍基地「惡魔之島」的沖繩居民超越國族身分界線，與其他弱勢族裔人民「共有」戰爭的歷史經驗與創傷記憶，連帶抵抗以國族為名的戰爭與「戰後」暴力之可能性。

關鍵詞：戰爭記憶、戰爭責任、戰後責任、台灣人日本兵、沖繩戰

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ith literary representations of memories of world war II in three novels, including Taiwanese writer Song Ze-Lai's "The Last War" (1976), Chen Ying-Zhen's "The Zhong-Xiao Park" (2001), and Okinawa writer Medoruma Shun's "Droplet" (1997), exploring how Taiwanese and Okinawa writers intervene in the heated debates on war and postwar responsibility in East Asia. Through divergent writings of East Asian war memories and memory wars, how do these novels demonstrate the historical predicaments of Taiwan and Okinawa? How do the issues of war memories intersect and entangle with postwar national identities? Locating three literary texts in historical contex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dition in which war memories of Taiwanese Japanese-soldiers and Okinawa inhabitants are in danger of being incorporated into Japan's national war narrative, as a consequence of emphasizing their contributions "fighting as Japanese" in the debates of war and postwar responsibilit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s ambivalent and confused historical subjects, the very existence of Taiwanese Japanese-soldiers and Okinawa inhabitants have disturbed the singular alignment of body, nationality, and war, and therefore problematize their bodies "fighting as Japanese," challenging national war narratives and politics of war memories in East Asia. Furthermore, the historical dynamics of these "non-state" bodies also connect to the possibility for Taiwanese Japanese-soldiers and Okinawa inhabitants to cross national demarcations and shar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traumatic memories of war with other minority people, and work together to resist wartime and postwar violence in the name of nationalism.

Keywords: war memories, war responsibility, postwar responsibility, Taiwanese Japanese-soldier, Okinawa War

一、前言

90年代隨著日本右翼軍國主義復活，日本在戰前的殖民責任、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戰爭責任、戰後的道歉賠償等歷史問題，再度成爲世界矚目的焦點。自稱歷史修正主義派的日本保守派學者批判日本戰後以來的「自虐史觀」造成日本人不必要的罪惡感與自卑感，他們除了謳歌日本在戰時的軍事行動爲保衛亞洲抵抗英美入侵的「聖戰」，重新肯定「大東亞共榮圈」的理念，並針對日本在戰後受到的主要控訴提出反駁：東京審判是勝利者（美國）的審判、南京大屠殺是虛構的、原日本軍「慰安婦」是自願的等等。日本歷史修正主義派在東亞各國引發的爭議，可視爲東亞地區在戰後冷戰體制下無法充分處理的殖民與戰爭責任問題，在後冷戰時期的重新浮現。

因應這樣的政治氛圍，90年代後期的台灣、沖繩兩地與日本之間，針對二戰期間「戰爭的記憶」，分別產生激烈的「記憶的戰爭」。在台灣，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便有台灣人軍夫、軍農受徵召到中國大陸服勞役。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殖民政府在台灣實施陸軍與海軍的特別志願兵制度，調派到南洋各領地的日軍基地。從1944年9月到日本投降爲止，正式實施徵兵制度。整個二戰期間估計有8萬多名台灣人成爲日本兵，被徵召爲軍屬（包含軍夫）的則有12萬人，合計20多萬人。根據日本厚生省在1973年發表的紀錄，台籍日本兵戰歿者有30,304人，其中包含軍人2,146人，軍屬28,158人。（李國生 1997）¹

戰後到了1974年，台東阿美族原住民「高砂義勇隊」李光輝在印尼摩洛托島(Morotai Island, Indonesia)叢林被發現，日台媒體爭相報導，長久以來受到政府與社會漠視的原台灣人日本兵問題浮上檯面，引發原台灣人日本兵要求日本政府支付弔慰金、歸還積欠的軍餉與台

1 台灣民間的統計數字則遠超過日本厚生省，估計確知陣亡者53,300餘人，永久失蹤者92,700餘人（李國生 1997：224）。關於戰爭期日本在台灣軍事動員，另外可參考：近藤正己(1988)；鄭麗玲(1994)。

灣人寄存於野戰郵局的軍郵儲金。民間團體與日本政府交涉的過程中，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基於現實外交考量與戰前台灣人的日本皇民身分敏感，均未提供協助。一直到90年代，韓國、中國等東亞各國針對日本竄改歷史教科書、「慰安婦」問題等提出抗議，要求日本政府補償、道歉時，台灣政府仍然保持沉默。2001年2月，小林善紀的漫畫《台灣論》中譯本在台灣出版，婦女救援基金會召開記者會批判漫畫中許文龍、蔡焜燦兩人的「慰安婦自願說」，引發親民黨、國民黨與新黨政治人物的抗議、焚書，導致內政部對小林善紀作出禁止入國處分。但實際上，在野政治人物攻擊的目標並非日本政府或漫畫家，而是新政府總統府資政的奇美董事長許文龍等獨派人士，使得整個「台灣論」事件呈現統獨意識形態對立介入追究日本戰爭與戰後責任的複雜局勢。

在沖繩，1879年從琉球王國（中國的藩屬國）被併為日本國沖繩縣之後，長久以來受到日本的歧視與不平等待遇。1945年4月，美軍越過台灣直接登陸沖繩，展開長達84天的沖繩戰。²在這日本國內領土唯一的陸戰當中，沖繩成為美日的決戰地，然而，在沖繩的精銳部隊第九師團已經移防台灣新竹的狀況下，³日軍面臨戰鬥力的嚴重不足，遂對沖繩居民進行全面性軍事動員。沖繩當地中等學校男女學生組成「鐵血勤皇隊」、「姬百合部隊」上戰場，犧牲半數以上。⁴逃

2 通常以1945年4月1日美軍從沖繩本島西岸上陸為始，到同年6月23日沖繩守備軍司令官自殺身亡為止。然而，事實上美軍登陸沖繩本島之前，已有往九州的避難船在途中沉船、空襲以及離島的犧牲者。6月23日沖繩司令官臨死前還下了最後一道軍令，命令各部隊繼續戰鬥到底，一直到秋天都還有零星戰鬥出現。6月23日的一星期後，兩艘由石垣島開往基隆的避難船遭敵機攻擊，一沉船一漂流到釣魚台，死者80多人。同年11月由台灣返回沖繩的船亦因故障造成百餘人死亡。（新崎盛暉1992：165-167）

3 日軍預測台灣將成為美軍進擊日本本國的第一戰地，1944年初下令台灣軍第三十二軍進入備戰狀態，9月將台灣軍升格為第十方面軍，沖繩第三十二軍被編入其中，並調派各地機動反擊部隊增援台灣。（李國生1997：39-41）

4 1944年12月第三十二軍沖繩守備隊司令部與縣政府協議，將沖繩縣的中等學校學生（14至17歲）加以「戰力化」。1945年3月由沖繩縣的師範學校與中等學校的男學生組成「鐵血勤皇隊」，並由沖繩師範學校女子部與沖繩縣立第一高等女學校的女學生組成醫護隊「姬百合部隊」。

難中的居民也受到日軍任意徵用，以「防衛隊」身分協助勞動甚至戰鬥工作，甚至連15歲以下的少年、65歲以上的高齡者、身體虛弱的病人也都被動員上戰場。此外，逃難中的沖繩老弱婦孺也被捲入美日兩軍的激烈戰鬥，加上日軍與居民之間衝突頻發，整個戰爭過程造成沖繩15萬人口當中，1/3左右的人喪生。

戰後，針對沖繩戰中日軍與沖繩居民之間的種種衝突，長久以來一直有所爭議，包含沒有戰鬥力的老弱婦孺被迫冒險乘船避難引起重大傷亡、日本軍官命令離島或本島的沖繩居民集體自決以免在戰事中礙手礙腳、不在徵召年齡內的男子被迫上戰場或勞動⁵、在語言不通（當時沖繩居民多使用方言）的狀況下居民被指控為美軍間諜而被就地殺害、日軍與居民爭奪飲用水與防空壕等問題。針對這些問題，引發了「歷史教科書問題」、「《某神話的背景》論爭」、「和平資料館問題」、「集團自決論爭」等爭議，發展為多起訴訟事件，至今仍在持續中。相對地，來自日本其他地方的陣亡日軍遺族，在沖繩以都道府縣為單位各自建造「慰靈碑」，碑文歌頌戰死士兵為國捐軀的英勇及大義凜然，間接肯定及讚揚戰時的軍國主義，對非戰鬥員沖繩居民的犧牲則隻字不提。不僅如此，戰後沖繩受到美軍統治，1972年「回歸」日本之後，在《日美安保條約》體制下美軍基地依舊存在，日本政府以「經濟振興策」的巨額預算補助，讓沖繩的美軍基地永久化，成為沖繩戰後「和平教育」的最大矛盾。根據2009年3月沖繩縣政府的統計資料，沖繩美軍基地約232平方公里，占沖繩本島面積之18.4%，基地比例最高的沖繩中部有23.7%的土地為美軍基地，在各方面侵害著沖繩居民的人權。

綜觀以上，台灣與沖繩在戰前均因文化差異與政治權力關係，受到日本的歧視與不平等待遇。二戰期間，兩地成為日本帝國的南方軍事基地，青年或受到強制軍事動員，或為了被認同為「真正的日本

5 甚至還有來訪沖繩的日本文化人大宅壯一，將戰後傳為美談的學徒隊「鐵血勤皇隊」、醫護隊「姬百合部隊」的犧牲評為「動物的愚忠」，引起縣民情緒反彈。參見大宅壯一(1959)。

人」，投入以天皇之名遂行的「大東亞聖戰」，造成相當大的傷亡。到了戰後，兩地與日本之間均針對戰爭責任與戰後責任問題產生種種爭議。然而，台灣與沖繩因戰前地位（日本的殖民地／國內縣）、從軍經驗（海外軍事動員／沖繩戰）、戰後與日本的關係（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沖繩由美軍占領至1972年後回歸日本）等地政學位置與歷史背景的差異，也造成兩地與日本之間「記憶的戰爭」當中國族身分議題的顯著差異。

本文以宋澤萊〈最後的一場戰爭〉(1976)、陳映真〈忠孝公園〉(2001)與目取眞俊〈水滴〉(1997)三篇小說中的二戰記憶書寫為題材，討論台灣與沖繩作家各自以何種立場介入東亞地區戰爭與戰後責任問題的爭議。本文討論的三篇小說作者均非實際的戰爭體驗者，小說本身亦非著眼於戰爭經驗⁶，而是往返於過去與現在之間，呈現「戰爭記憶」的流動性政治學：戰爭記憶不只是過去經歷與事件的如實再現，而是透過當下的政治立場與歷史意識形態所決定的角度，進行重新詮釋與定位。更重要的是，這三篇小說中的戰爭記憶書寫，均藉由重新歸返／召喚「過去」，將東亞「作為戰後的現在」加以「問題化」：1945年8月二戰雖然宣告結束，關於二戰的戰爭記憶、戰爭責任與戰後賠償等相關問題，卻因戰後東亞的政治局勢變動（美國勢力介入、日本天皇國家制的維持、國民黨政權敗退至台灣、南北韓分裂、冷戰體制的形成等），未能獲得適當處理，因而在戰後多年仍引發「記憶的戰爭」至今。因此，本文主要探討的問題為：三篇小說當中的戰爭記憶書寫，分別呈現台灣與沖繩在戰爭與戰後責任議題上的何種歷史困境？與兩地在戰後的國族身分議題呈現何種交錯與糾葛？藉由對這些問題的對照討論，本文試圖思考台灣與沖繩作為東亞地區的「非國家」島嶼，如何建立具體連帶關係，共同抵抗以「國族」為名的戰爭與「戰後」暴力。

6 台灣文學前輩作家鍾肇政、李喬、黃娟等人的大河小說均對台灣的二戰經驗有深刻描寫，陳千武更以自身的從軍經歷創作一系列小說。在戰後沖繩文學當中，以沖繩戰為題材的小說更是不勝枚舉，最廣為人知的應為石野徑一郎以女學生醫護隊「姬百合部隊」為題材的小說《ひめゆりの塔》（姬百合之塔），小說於1949年在雜誌上連載，之後多次改編為舞台劇與電影。

二、「那是我們十八萬的同胞用血用生命賺取的」： 宋澤萊〈最後的一場戰爭〉⁷

宋澤萊的〈最後的一場戰爭〉發表於1976年，小說中採用現在與過去交錯的敘事手法，描述原台灣人日本兵的里長伯福壽在妻子（兩個兄長出征海南島未歸）的鼓勵下，以「協助台胞軍夫討回日軍軍郵」為主要政見參選立委。選戰期間，妻子過於疲累病倒，福壽送她到醫院時以及選戰過程中，不斷往返於二戰戰場與現實的鹿港之間。福壽是在1944年7月以石油開採技師的名義被徵召到高雄受訓，8月被載送到距婆羅洲大陸一、二哩的打拿根島(Tarakan Island)上，在日本海軍101燃料科打拿根支廠勘測石油。1945年4月，盟軍登陸，日軍開始準備撤退，福壽被派遣為野戰砲兵。11月，101支廠某些長官切腹，部隊解散，福壽與台灣人、日本人戰友流落山中叢林，撿拾到的招降單上寫著日本已投降。1946年5月，福壽與戰友編造木筏乘坐到婆羅洲大陸，與相遇的日軍一起共營輾轉的流亡生活，直到8月中旬在睡夢中被澳軍俘虜。在俘虜營待了一年之後，終於在1947年6月下旬，回到睽違三年的台灣。

正如小說標題旁的題獻詞：「以這篇小說獻給家父，他在太平洋戰爭中曾作過毫無代價的犧牲」，福壽里長伯在婆羅洲的經歷，取材於作者父親的實際經驗，福壽努力要「協助台胞軍夫討回日軍軍郵」的情節，可說是作者對於父執輩「毫無代價的犧牲」的不平之鳴。根據作者自述，父親喝酒後常回溯二戰時的戰爭經驗，「說到激動時，都要深深感嘆，暗暗垂淚」。（宋澤萊 1984：272）多次傾聽父親訴說他那一代在殖民統治與戰爭下的悲慘命運，激發了作者對於台灣的瞭解、感情與責任。（ibid.: 273）據此，陳建忠曾提出，「宋澤萊部分以『戰爭經驗』為題材的小說正因為描寫的是『父親的歷史』，更可以代表戰後世代對台灣歷史由茫昧、困惑到瞭解認同的過程」。他並

7 最早發表於《中外文學》（1976年10月號），本文所採用之版本為後收錄於《等待燈籠花開時》（1988）之版本。

指出，相較於早期宋澤萊「現代主義小說中主角對父親軟弱、哀怨的形象大表嫌惡、排斥」（陳建忠 2007：24），這些創作於70年代「回歸現實」鄉土文學運動風潮下的作品，「轉而對父親及其歷史，致以痛切的惋惜而深表敬意」（ibid.），成為「打牛滿村」系列農民小說等鄉土寫實主義前的轉型之作。（ibid.: 13）除了父執輩的戰爭經驗傳承、鄉土文學風潮下對台灣歷史與現實的關懷之外，1974年「高砂義勇隊」李光輝被發現後引發的原台灣人日本兵求償運動，也是〈最後的一場戰爭〉重要的生產脈絡。

小說中作為故事背景的追討軍郵運動，可回溯到1974年11月，原台灣人日本兵在台北組成的「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台籍同胞日據時期存放日本軍郵局儲金討還代表團」（後稱「存日軍郵局儲金討還團」）。他們初步估計二戰期間的原台灣人日本兵約有20萬人，每人強迫存儲款項約為2,000餘元日幣，並推算出戰前一元日幣應折合當時300元日幣始為合理。（劉本炎 1975：39-46）除了台灣民間團體的追討軍郵運動，在日本的台灣人士也發起向日本政府要求傷亡撫恤等補償金的求償運動。1975年台灣同鄉會副會長王育德等人與明治大學宮琦繁樹協力策劃，由親台的日本眾議員有馬元治組成「台灣人原日本籍士兵補償問題思考會」，並於1977年正式向東京地方法院對日本政府提訴民事補償金給付。（林志剛 1994a：39-40）原台灣人日本兵對日本政府的提訴，主要基於軍人軍屬契約關係、日本憲法中關於國家補償之規定、戰死傷者之各種特別國家補償法（《特別措置法》、《援護法》及《恩給法》）之國籍條款違反憲法第十四條平等原則等理由。

創作發表於原台灣人日本兵求償運動初期的〈最後的一場戰爭〉，以什麼樣的角度理解、再現原台灣人日本兵的歷史經驗？30年前的戰爭記憶如何化為當下參與政治實踐的動力？過去與現實的敘事交錯，凸顯原台灣人日本兵戰爭記憶的何種性質與意義？事實上，小說中並沒有交代相關歷史背景，只簡短提到福壽抵達打拿根開始工作之後，「薪水一個月二百元，除了發給三十元外，其餘的據說都寄回台灣」

(162)⁸。而且，福壽參加立委選舉以「協助台胞軍夫討回日軍軍郵」的行動，亦設定為基於個人理念的單獨行動，而非以團體進行的政治行動。小說中雖然沒有大聲疾呼戰爭求償的主張，但透過慘烈的戰爭經驗書寫，可以感受到強烈的政治訊息與力量。小說中對於原台灣人日本兵從受訓、出發、抵達異鄉的日軍基地工作、戰局逆轉後日軍撤退、部隊解散、漫長難熬的流亡生活、被俘虜於集中營、遣返的整個過程，進行鉅細靡遺的描寫。正如福壽在送妻子就醫時，回覆記者討回軍郵為何如此重大時表示：「那是我們十八萬的同胞用血用生命賺取的」(158)，福壽親身經歷或目睹的傷亡、失蹤、飢渴、病痛等身體的慘烈受苦經驗，便足以說明這些積欠的日軍軍郵，意味著原台灣人日本兵付出的多大犧牲，以及福壽追討軍郵行動的動機與意義何在。

除了戰爭經歷的慘烈，小說敘事者也針對日本帝國灌輸台灣人皇民意識，並以「志願」之名強制動員台灣青年上戰場為天皇赴死，進行歷史批判。小說中，福壽與三十幾個台灣青年在高雄受訓，「耐心等待著出發」到打拿根的日本海軍基地，敘事者以整段的篇幅來質問台灣人「為誰而戰」、「為何而戰」的滿腹疑問與深沉無奈：

夏日的高雄混雜著不可思議的焦躁，沒有人真的在想些什麼，雖然帝國主義的天皇意識籠罩在年輕一輩的心裡，但下意識裡誰都清醒，台島的整個不幸就具體的顯現在自己的身上，不管你是誰，一上了疆場，你的身上就會烙下一個印記，留待死神去指認你。等到一粒盲目的槍彈在叢林區將你的生命帶走，如果有人翻過你腐爛的身軀，他們一定會問：這位台島的青年為什麼要到這裡來，你回答他說：因為我們是皇民。但是他們又會問，皇民除了送死以外沒有什麼可做的嗎？這時你也只好啞然了。(152)

敘事者將原台灣人日本兵的遭遇視為二戰期間整個台灣島的「不幸」之縮影，採用第二人稱的質問語法，揭露殖民地異民族戰爭動員的悲劇本質。敘事者以第二人稱的「你」來指稱不特定的台灣人日本兵，製造讀者受到指稱的感覺，喚起讀者設身處地思考台灣人日本兵遭遇的同理心。同時，又透過「質詢」(interpellation)的形式，讓身

8 編註：本文僅出現頁碼處，即表示為所討論之該篇小說出處標明。

軀已經腐爛、卻仍不忘抱持「皇民」意識的台灣青年，對於自己為天皇送死、陳屍異鄉的理由無言以對，批判日本殖民政府以效忠天皇國家之名，美化對台灣人被殖民者的異民族戰爭動員。緊接著，敘事者繼而以花朵的意象，諷喻日本以「志願」、「玉石俱焚」、「武士」精神之名美化戰爭的行徑：

七七事變後，華北情勢緊張，日本調集一部分台島的志願軍轉赴作戰，說是志願軍也還是托詞，就好比非死不可也還要說是玉石俱焚，福壽仔看過那些青年人即將離鄉時，往往在慶祝會上狂熱地酗酒，爾後大呼天皇萬歲，那種熱情勝過十支鋒利的武士刀，但每個人都會瞧見他們的眼睛裡掛滿了淚，即使十串的珍珠也沒有那些晶瑩剔透，好像台島的人一切的情感都枯萎了，冤屈都蟄伏了，他們需要用酒精去灌溉，然後在朦朧裡在霧裡長出一朵真情而悲哀的花，那花萼還必須掛上帝國無疆的招牌。(152)

對比於出征「慶祝會」中狂熱酗酒、高呼天皇萬歲之「熱情」，珍珠般的眼淚訴說著台灣人青年被壓抑的「情感」與「冤屈」。台灣人青年必須藉由大量酒精麻痺知覺，才能綻放「真情而悲哀的花，那花萼還必須掛上帝國無疆的招牌」，頂著「日本皇民」的名號，凋零在異鄉戰場上。

值得注意的是，〈最後的一場戰爭〉中對於戰爭本質的省思以及對於戰死者的哀悼，並不只限於台灣人同胞，對於日本人的傷亡與受苦，也給予人道主義式的同情。在福壽的經驗裡，台灣人在戰地並沒有受到日本人歧視。小說中描述，從高雄前往婆羅洲的船上，「日本的軍官還客氣，一逕都是殷殷勤勤的招呼，好像大東亞真的全都同化了，融合了。那是因為這裡頭的台胞都是受過良好教育，溫文有禮並不下於日本人，加以同搭一船，生死就相關，盲目的歧視不會在苦難裡發生」(154-155)。尤其在部隊解散之後，台灣人漢人、原住民與日本人士兵結伴流亡，在生死與共的過程中，建立深厚的同袍情感。台灣人同情染上瘧疾的日本人戰友，雙方合作在極限狀態下求生，談論著平安回到故鄉的夢想。雖然福壽最為掛心與同情的，還是台灣人戰友的安否，但是不管是身體遭受的傷痛與飢餓，或是對於故鄉與親人的思念情懷，超越了民族與身分之區別，成為台灣人與日本人共通的戰爭經驗。

戰爭結束之後，福壽對於葬身異鄉戰場的台灣人同胞還是最為念念不忘，並感受到強烈的責任感。當年除了眼睜睜看著多名台灣人戰友悲劇的死亡、發狂與自殺，某次福壽在婆羅洲還發現三個台灣兵陳屍於路邊草叢，與夥伴特地幫忙掘墳予以埋葬。「屍體蒼白淒絕的神色震撼了他衰竭的心臟」，福壽低聲表示：「將來若果回了鄉，一定得好好為他們招魂建醮」(179)。雖然只是30年前個人私下的承諾，福壽堅持在他衰老倒下之前，為受到戰爭摧殘的台灣人同胞討回他們「用血用生命賺取的」報酬，讓他們的犧牲不至於白費。

小說最後，投票結果即將揭曉，福壽走入寢室探望臥床的妻子：「窗外的龍山寺沉沉陷入夜的懷抱中，一盞盞的燈把寺廟的輪廓凸現出來，重重的門庭狼牙飛簷，顯露永不頹喪的姿態，像年輕輕的臉在煙塵市塵的廝磨下老邁了、皺紋了、蠟黃了，但仍然沒有忘卻昔日三山五海的抱負」(196)。小說中以鹿港龍山寺的意象，象徵福壽伯老當益壯地站出來為傷亡同胞爭取權益的姿態。歷經世代風霜的龍山寺雖然不再風光，但仍「顯露永不頹喪的姿態」，沒有忘卻年輕時代許下的「三山五海的抱負」。身為少數的倖存者，福壽擔負了歷史見證的使命，以及為無法活著回來的同胞討回公道的重大責任。不僅止於龍山寺的意象，小說整體的敘事交錯往返於過往的異鄉戰場與現在的鹿港之間，藉由夢境、廟會乩童的儀式性自殘行為與神鬼地獄的世界、鄉村景色的相似、各種喧擾聲音的媒介，讓福壽不斷穿梭在過去與現實之間。同時，也透過故事舞台鹿港古鎮充滿歷史感的厚實意象，表現福壽為原台灣人日本兵爭取權益的歷史使命及任重道遠。

發表於原台灣人日本兵求償「初期」的〈最後的一場戰爭〉批判日本殖民政府強制台灣青年頂著「日本皇民」之名陳屍異鄉戰場，依此主張討回日本積欠的軍郵為原台灣人日本兵應得的權益，所傳達的是原台灣人日本兵追討軍郵運動的歷史動機與社會意義——「那是我們十八萬的同胞用血用生命賺取的」。小說結尾似乎也暗示著，福壽將會如願當選立委，實現「昔日三山五海的抱負」為戰死異鄉的台灣人同胞爭取權益。

然而，歷經近20年的努力之後，原台灣人日本兵的傷亡撫恤金求償運動與追討軍郵運動最後卻以失敗告終。「台灣人原日本籍士兵補償問題思考會」為中心的求償運動在歷經漫長的訴訟過程後，1982年東京地方法院的一審判決、1985年東京高等法院的二審判決均宣告原告敗訴。「台灣人原日本籍士兵補償問題思考會」在訴訟求償的同時，積極向日本政界進行遊說等政治運作，於二審判決後，成立補償問題之議員懇請會，促成日本國會於1987年9月通過「關於對台灣住民戰歿者遺族之弔慰金等之法律」，12月通過對戰死及重傷者每人200萬日圓之補償額度預算案，並於翌年9月與台灣紅十字會協力正式發放。然而，原告台灣人仍堅持持續上訴，因為他們抗爭的「不單是個人的權利補償，更要求日本政府對此有公式（作者註：正式）的回應及全面性公平的待遇」。1992年4月日本最高法院歷經7年之審理作出終局判決，再度全面駁回上訴之請求。同年7月，「台灣人原日本籍士兵補償問題思考會」宣告解散，終結該會17年的求償運動。（林志剛 1994b）

日本政府用來拒絕支付原台灣人日本兵的傷亡撫恤金與軍郵的主要理由有二：第一、台灣人已經失去日本國國籍，無法適用於《特別措置法》、《援護法》及《恩給法》等特別國家補償法。第二、1972年日本與中共建交後與台灣中華民國斷交，使得中日和約失效，補償之交涉協議無法進行。關於第二個理由，可追溯至1952年4月的中（中華民國）日合約當中，約定「日本對台灣住民請求權（含債權）之處理」，將由兩國政府間之特別協議解決之。同年8月，台灣居民因中日和約生效而一律喪失日本國籍。1953年日本政府恢復《恩給法》等戰時軍人軍屬補償弔慰，依其國籍條款，已不具日本國籍的原台灣人日本兵無法請領。1960、1962、1965年，日本政府三度以書面向中華民國政府敦促針對日本政府對台灣居民與自治團體補償等問題進行協議，但未獲回應。1972年日本與中共建交，與台灣中華民國斷交，中日和約以及和約中對於債權請求進行協議之約定也隨之失效。（林志剛 1994a：41-42）在日後的訴訟過程中，這也成為日本地方、高等與最高法院判決原台灣人日本兵敗訴的兩個主要理由。

因應這樣的狀況，前述1974年底成立的「存日軍郵局儲金討還團」發起人之一的黃同吉表示，原台灣人日本兵是以「戰時日本人的身分，向日本政府討還戰時的欠債，這自然不受中、日和約第三條的限制」。(劉本炎 1975：41)然而，對於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來說，台灣人公開自稱「日本人」，即使是指稱過去戰時的身分，也是一種國族身分的「錯亂」。因此，在1975年一篇從國際法的角度討論追討軍郵運動的文章當中，作者雖然主張日本應該歸還原台灣人日本兵的軍郵，也承認若以「戰時日本國民身分」來討還日本政府戰時欠債，將比透過外交關係更容易有利。然而，文章中也不忘強調，「若在任何一種可符合日本利益或其政府意願而於我不利的條件下，縱使可以討回，亦應堅拒」。(ibid.: 44)

從這樣的歷史脈絡可以清楚看到，原台灣人日本兵求償運動不只是日本的戰爭與戰後責任問題，更牽涉到1970年代台灣國家定位與國際地位的危機，以及在此過程中台灣國民黨政府對原台灣人日本兵問題的刻意迴避：1960年代不願出面與日本交涉原台灣人日本兵的補償問題，使得70年代中日斷交、中日和約失效後協議無法進行；70年代中期以後，對於中日民間發起的求償運動則抱持警戒態度，不願以國家的立場出面給予協助。

這也是為什麼在〈最後的一場戰爭〉當中，福壽試圖藉由參選立委，以喚起政府與社會大眾向來迴避與漠視的原台灣人日本兵問題。小說中藉由戰後台灣社會與選舉政治的虛妄性質，批判戰後台灣社會未能正視、反思戰前台灣人受到日本戰爭動員之歷史經驗，不但對當時的歷史受害者有失正義公理，也造成世代間歷史經驗的斷裂。小說中，福壽具有歷史使命感的誠懇政治理念，對照的是台灣選舉政治炒作話題、虛張聲勢，無法真正為小老百姓爭取福利的作秀性質。小說中以戲院作為政見發表會的場所，「燈光從二層看台的放映處投過來，罩住了整個講壇，把發言人的身影拉長了，競選世界和演戲生涯混在一起，現實和非現實交雜了，合著分不開了」(184)。與另一個常出現的「夢境」一樣，小說中透過戲院「現實與非現實交雜」難分的場景設定，讓敘事得以瞬間跨越時空對照過往異鄉戰場與當下鹿港選

舉，並對現今這「沒落的時代，走下坡的時代」(174)，選舉政治脫離現實問題進行嘲諷的批判。

小說標題的「最後的一場戰爭」不僅指稱台灣人日本兵參與日本帝國榮光墜落的最後一場戰爭，也意味著福壽雖然已經步入衰老（以鼓勵他競選的妻子斑白的頭髮與灰黑的面容來顯示），仍堅持要奮力一搏，打完他人生中最後的一場「戰爭」，讓當年陳屍戰場的台灣人同胞能真正安息。當年從婆羅洲戰場歷劫歸來的福壽，在戰爭已經結束30年之後，卻還要披掛上陣打人生中「最後的一場戰爭」，呈現了原台灣人日本兵的歷史困境：對外面臨戰後東亞政治局勢轉變與台灣國家定位問題，對內面臨國民黨政權與社會大眾的迴避與漠視。原台灣人日本兵的歷史經驗與戰後權益受到忽視，無法真正擺脫創傷的歷史與記憶，無法真正進入「戰後」。

不僅如此，在國際與國內政治的孤立狀況下，原台灣人日本兵求償運動還導致他們在國族身分議題的衝突與混亂：原台灣人日本兵必須要被「認可」為日本人，才能以「日本國民」的身分接受戰爭賠償。然而，在日本戰敗、台灣歸還中國之後，他們在戰爭期間受到軍事動員的「日本皇民」身分已不復存在。再加上，1972年台日斷交，造成台灣無法以對等國家的身分與日本進行協商。這就是為什麼「存日軍郵局儲金討還團」發起人黃同吉必須以「戰時日本人的身分」這種予人時代錯誤之感的特異身分進行軍郵追討之原因。在這樣的國族身分矛盾之下，原台灣人日本兵不但必須面對求償運動的挫折，在戰後台灣社會，也面臨時代錯誤或是未能擺脫「奴化」精神的批判。陳映真發表於2001年的中篇小說〈忠孝公園〉所呈現的，正是原台灣人日本兵這樣的歷史困境。

三、「殖民地台灣對母國日本深情的孺慕和嚮往」： 陳映真〈忠孝公園〉

陳映真〈忠孝公園〉透過台灣人林標的戰爭記憶與戰後生涯，回

顧70年代中期以後原台灣人日本兵戰爭求償的歷史，並深入探討求償運動背後牽涉到的複雜國族認同問題。同時，小說中透過林標在高雄「忠孝公園」與外省人馬正濤的相遇，帶出另外一段截然不同的二戰經歷與戰後遭遇，將原台灣人日本兵的歷史經驗加以相對化。二戰期間，出身農民家庭的林標被徵召到菲律賓當駕駛軍夫，隔年他透過信件得知妻子為他生下一個男嬰。戰局逆轉後，美軍反攻菲律賓各島，林標與潰散的部隊及日僑婦孺一同在熱帶莽林中流亡。在逃竄途中，對於未曾謀面的兒子之愛念燃起他強烈的求生意志。1948年林標從俘虜集中營回到台灣，妻子已在一年前貧病而死，留下4歲的兒子欣木。

在林標的戰爭記憶當中，雖然日本人對台灣人日本兵有所歧視，「不時地提醒台灣人其實並不是真正的日本人」(149)，然而，在戰場上，「台灣軍屬和軍夫確實被美軍、被菲律賓人游擊隊當作他們所仇恨的日本人，用炸彈炸爛四肢，用子彈轟開腦袋。當台灣兵走在大街上，開店華僑表面上堆著諂笑，但眼中深處卻透露著把台灣人日本兵當作真日本人的恐懼、憎恨和嫌惡」(148)。〈忠孝公園〉雖然與〈最後的一場戰爭〉同樣呈現台灣人被強制送到異鄉戰場，作為日本兵捲入戰爭的慘烈經驗，並描寫林標幫忙同為泉州人的華僑商人一家逃過日本屠殺的行動，但小說中也提到，台灣人軍夫雖無法配備任何武器，但仍有少數台灣人在大陸戰場上對中國百姓燒殺姦淫，「沾上日本軍隊獸行的血跡」。林標所在的菲律賓戰場上，也曾聽說協同日本人殘暴虐待美國與加拿大人戰俘的台灣人日本兵，在戰後被當成戰犯處刑。⁹即使林標只是「殺人煉獄的旁觀者」(189)，也無法揮去日軍屠殺菲律賓游擊隊與平民的殘忍場景。作者陳映真曾在接受訪談時表示：

台灣一直缺乏嚴肅、認真對待自己的精神，也正因為缺乏正視和凝視過去的勇氣，譬如台灣的皇民化，才會出現小林善紀的問題。所以在〈忠孝公園〉中我特別處理心靈的

9 1998年原台灣人日本兵林水木首次以台灣人BC級戰犯的身分提出訴訟，請求日本國家賠償。林於二戰期間在婆羅洲擔任日本軍俘虜監視員，戰後在軍事法庭以「虐待俘虜」的罪名求刑15年。雖然他在1972年取得日本國籍，但因軍人在職年數過短，無法如其他日本人BC級戰犯以軍人身分領取國家恩給。參照李展平(2007)。

負擔——馬正濤和林標都背負著過去的罪疚。而小說家也正是在扮演這樣凝視的角色。（郝譽翔 2001：29-30）

在小說中，馬正濤「過去的罪疚」來自於他在東北多次易主的歷史動盪中，擔任不同政權的特務，殺害了不下一、兩百人的敵對地下特務；而林標「過去的罪疚」則是作為日本人，在各地戰場上直接、間接參與戰爭屠殺而產生。作者追究「過去的罪疚」之創作動機與角度，使得〈忠孝公園〉不像〈最後的一場戰爭〉將原台灣人日本兵的戰後求償運動定位為正義公理的戰爭，而是主張在以「被害者」的角度進行求償之前，對於自身的「加害者」角色也需進行徹底的反省、清算與自我批判。

然而，陳映真在小說中對林標「過去的罪疚」之「凝視」，不是為了追究原台灣人日本兵的戰爭責任，而是為了批判原台灣人日本兵在戰後以「被害者」姿態向日本政府進行求償運動時，強調自身當年「作為日本人」在戰場上受到的傷害。因此，小說中以負面的角度呈現原台灣人日本兵求償運動。1980年前後當年的宮崎小隊長來台，林標與其他原台灣人日本兵開始籌組日本菲律賓戰友會的台灣分會，以爭取日本政府比照日本軍人發給原台灣人日本兵「恩給」與「年金」。小說中描寫宮崎小隊長來台的歡迎酒宴如下：

在台北這家日本料理店裡的、充滿了懷舊和歡快的重逢，看來老宮崎和其他的原台灣人日本老兵都把林標的兩顆血牙全忘得一乾二淨了。酒過三巡，大家仗著酒精的興奮，開口講起遺忘得差不多了的日本話的膽子也大了，使一個小房間裡嘖嘖咕咕地漂流著破碎的、台灣土腔的日本話。但聽在宮崎的耳朵，這些破碎的、不正確的日本語何等動聽，恰恰表現了殖民地台灣對母國日本深情的孺慕和嚮往。宮崎受到了感動。霎時間，宮崎不再只是個戰後吃國家「恩給俸」的潦倒老人，而又復是當年帝國軍隊小隊長了。宮崎於是漸漸失去了開頭時的矜持，開始肆情喝酒，把一個發皺的、鼻子下長著一撮鬍子的臉喝得通紅，越發襯出了稀疏的頭髮和鬍鬚的枯白。(143)

宮崎小隊長原本對當年戰場上的暴力相對感到慚愧，卻受到原台灣人日本兵的盛情款待，曾金海等人甚至表示，「大家都很懷念在南方的日子」(142-143)。台灣人「破碎的、台灣土腔的」、「不正確」的日本話，原本是台灣人在二戰期間被迫作為日本人而戰、卻又在戰

場上受歧視的被殖民者民族表徵，在戰後三十多年的台日「充滿了懷舊和歡快的重逢」酒宴上，卻「表現了殖民地台灣對母國日本深情的孺慕和嚮往」，成為台灣對於日本的後殖民鄉愁之「動聽」表現。

在昔日部屬與被殖民者的盛情歡迎之下，潦倒的宮崎小隊長彷彿「又復是當年帝國軍隊小隊長」，並強調日本絕對沒有忘記「在台灣的日本忠良的臣民」。曾金海也呼應道，組成戰友會台灣分會爭取補償的意義「不是金錢的問題」，「是爭取我輩為日本人、為天皇赤子的運動」(145)。眾人得知組成戰友會後可能得到日本國家一大筆「恩給」之後，便帶著酒意以日語齊唱〈軍艦進行曲〉。這個場景批判原台灣人日本兵在求償運動中強調自己當年為「大日本帝國皇軍的、無愧的一員」(147-148)、「爭取我輩為日本人、為天皇赤子」，呈現國族認同的混亂；台日戰爭體驗者在求償運動中的協力關係，甚至產生懷念、美化日本帝國主義與戰爭的傾向，與他們對於日本軍國主義發動戰爭造成傷害之控訴有所矛盾。

在「南洋戰歿台灣兵慰靈碑」揭幕儀式的場景中，作者便以諷刺性的手法，將原台灣人日本兵求償運動呈現為時代錯誤的荒謬鬧劇。小說中，因為總統大選而重新恢復求償熱勁的曾金海，帶著（民進黨）立委為「換一個政府」向原台灣人日本兵拉票，並在屏東成立「南洋戰歿台灣兵慰靈碑」，邀請日本政軍界參加揭幕儀式拉近關係，以利求償運動的進行。儀式結束後，返回家中的林標從螢光幕上看到揭幕儀式的新聞報導，原台灣人日本兵穿著漿燙過的日本海軍戰鬥服、頭戴戰鬥帽站在觀禮台前，「在迅速流動的鏡頭中，林標瞥見了一張張眼袋凸出，緊抿著嘴唇的、認真嚴肅、卻又力竭失神的表情」(158)。接著，「由一班小鎮上送葬儀隊湊成的樂隊，突如其來地吹奏起日本人的〈軍艦進行曲〉」(158)，前排瘦高老兵掌著的日本海軍軍旗在風中飄揚，「旗上血紅的旭日突兀而奪目」(158)。

相較於〈最後的一場戰爭〉以鹿港古鎮的形象譬喻為求償運動奔走、老當益壯的福壽，〈忠孝公園〉中的林標等原台灣人日本兵在年紀上更為衰老，打起戰後求償的「戰爭」顯得「認真嚴肅、卻又力竭失神」。「送葬」儀隊吹奏〈軍艦進行曲〉的意象，呼應當年林標出

征前日本上官以誦讀「祭文」的腔調之訓話，揭發光榮戰士英武形象掩蓋的赴死下場。更重要的是，昔日的出征青年如今已成來日不多的垂垂老者，與雄偉的軍樂及漿挺的戰鬥服不僅不協調，甚至構成時代錯誤的諷刺場面。小說中，林標「頭一次看到鏡頭中老態龍鍾、疲乏不堪的『軍容』，不禁吃驚。慢慢地感覺到他自己和那些老人彷彿受著不堪的嘲笑和愚弄」(159)，透過電視螢光幕，林標才目睹穿著海軍戰鬥服投入求償運動的自己與戰友們，從當下社會的角度觀之，竟是時代錯誤的身影，而感覺到「受著不堪的嘲笑與愚弄」。然而，日本政府以台灣人「已喪失日本國民的身分」之理由，拒絕給予與日本軍人同樣的待遇。因此，小說中組織台灣戰友會的曾金海向林標表示，因為「他們日本人不承認我們是日本人」(222)，所以現在不再爭取復員軍人的「恩給」，而是追討日本人拖欠至今的未付軍餉、沒有結算的軍郵儲金。更受打擊的是，新政府上任後，並沒有如選戰時所承諾地代為交涉爭取，而是以「新政府特別需要外交支持」為由，要求原台灣人日本兵接受日本以200倍（而非他們所希望的1,700倍）計算的軍郵。¹⁰除了求償運動失敗，為了求償運動而標榜「曾為日本人」的過往國族身分，也使得原台灣人日本兵在台灣社會受到異樣眼光與批判。

小說結尾，為了戰爭求償運動而忽略孫女，造成兒孫離散的林標，質問久違的孫女帶回來的日人男友日本政府為何拒絕補償，在孫女氣憤離去之際，「用日語哭嚎著，『我到底，是誰呀——』」(229)。林標十多年來對於求償運動的執著投入，不但造成他與至愛兒孫的離散，最後更導致他陷入國族與自我認同的錯亂。

從以上的討論可知，作者陳映真對於原台灣人日本兵求償運動投以批判的視線，認為曾受日本「奴化」教育、以「皇軍」之名協助

10 這段小說情節對照追討軍郵運動在1990年代初期的後續發展。1993年，由日本新黨魁細川護熙組成的新政權（時隔38年的非自民黨政權）首次公開承認日本在二戰期間的軍事行動為侵略行為，並對日本的戰爭與殖民統治責任道歉。之後，日本政府正式將欠餉、軍郵儲金、郵局存款、簡易保險、年金5項稱為「確定債務」，表示將予以賠償。1994年，日本國會立法通過將5項「確定債務」根據通貨膨脹計算，按照面額120倍補償。然而，多數原台灣人日本兵認為倍率不合理，拒絕出面領取。

日本侵略戰爭的原台灣人日本兵，戰後卻以「受害者」身分自居，甚至爲了「瘋想、癡想」大筆補償金，對當年戰爭發動者的日本表現「深情的孺慕和嚮往」。陳映真基於中國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與再現角度，使得他無法理解與同情本省籍台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被迫作爲「日本人」而戰，戰後在國民黨高壓統治下對「祖國」失望，轉而「懷念」日本殖民統治的複雜悲痛歷史經驗；也無法理解與同情他們從二戰期間至戰後，因台灣地位一再轉變而無法獲得撫恤與賠償，被迫轉而爭取日本政府對自身戰前的「日本皇民」身分與戰爭貢獻予以認同之歷史困境。正如陳建忠指出的，陳映真不滿於原台灣人日本兵爲了爭取日本政府的補償而「爭取被承認自己曾爲日本人」，「從特定的民族主義立場來看」或許是「罪無可恕」的，「但，人性被扭曲、權利被漠視的問題，又該是誰可以來爲之平反、申訴的呢？歷史雖然塑造了一群『奇特』的台灣人，但他們卻全然不是歷史的創造者，而是歷史的邊緣人」（陳建忠 2003）。¹¹

同時，作者的歷史反省與批判，明顯只針對原台灣人日本兵在戰後求償運動中產生的自我矛盾與國族身分混亂，以及「台獨親日」意識形態中台獨派與日本右翼的共犯關係，卻沒有批判台灣國民黨政府與社會在戰後對原台灣人日本兵問題的迴避與漠視。作者讓林標對於「爲了國家」必須犧牲自我的冠冕堂皇說辭，提出強烈的質疑與批判，然而批判的對象僅止於日本政府與新成立的民進黨政府，直接跳過國民黨政府以民族大義與國家利益之名，不願替本省籍台灣人追究日本的殖民與戰爭與戰後責任。

這兩個歷史觀照的盲點，在小說另一個主角馬正濤的形象設定上也可以清楚觀察到。出身東北的馬正濤爲親日豪商之子，建國大學法律學部畢業後，先後爲「滿洲國」的日本憲兵、接收東北的國民黨、共產黨與退守台灣的國民黨擔任特務工作。他與本省籍的林標同樣爲

11 據此，陳建忠認爲陳映真在〈忠孝公園〉當中已經失去「白色恐怖系列」小說時的理想性格、使徒的愛心與憐憫、人性的關照，使得這篇小說成爲「益形僵化的歷史認識的『文學化』營爲」。

異民族日本「效忠」過，在日本投降後面臨國族身分的劇烈轉換，呈現個人在大時代的戰爭與政權轉換下顛沛流離的共同命運。然而，相對於林標終其一生不斷苦惱於與「日本」國家的認同糾葛，馬正濤則是不斷自在轉換身分與效忠對象，完全沒有認同轉換的問題。不僅如此，在小說的人物造型上，相對於林標的猥瑣、愚忠與貪財，馬正濤則被賦予威風凜凜的英雄形象。一直到小說結尾，國民黨失去台灣江山，馬正濤才產生認同的崩解，他過去的罪行面臨曝光的危險，「他成了墜落在無盡的空無中的人。他沒有了前去的路途，也沒有了安居的處所。他彷彿忽然被一個巨大的騙局所拋棄，向著沒有底的、永久的虛空與黑暗下墜」(220)。雖然小說最後馬正濤藉由死亡來逃避這種「虛空與黑暗」，然而，他獨自用手銬銬住自己，臉上帶著似笑非笑神情自殺的設定，較之林標的晚景蒼涼與認同錯亂，毋寧具有悲劇英雄的形象。

同時，具有明確左翼立場的陳映真，並沒有關注到林標與馬正濤的階級差異如何影響其戰時與戰後經驗：馬正濤出身上層階級的特權身分，正是他得以不斷轉換身分以逃避政治責任的原因；身為台灣一介農民的林標，則只能毫無選擇地作為日本軍夫上戰場，並在戰後必須自力更生。作者之所以無法關注到這樣的階級差異，不外是因為他對於2000年前後政黨輪替下「台獨親日」派勢力崛起的政治氣候變化之焦慮。正如〈忠孝公園〉當中馬正濤等外省人老兵對於原台灣人日本兵的歧視性刻板印象所顯示的，台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皇民化」與「日本兵」戰爭經驗，與戰後兩岸政權的「八年抗戰」抗日國族歷史敘事是互相敵對的。戰後台灣國民黨政權與主流文化基於中國民族主義，將原台灣人日本兵求償運動等台灣人的殖民與戰爭歷史議題，簡化為狹隘的「台獨親日」政治意識形態，造成台灣人的歷史記憶在戰後台灣社會不受到正視或是捲入政治鬥爭當中，無法獲得正面的回應與省思。〈忠孝公園〉既然沿襲了此一國族本位的歷史批判角度，也就無法達成作者陳映真藉由此作所欲喚起的「嚴肅、認真對待自己的精神」、「正視和凝視過去的勇氣」了。

不過，引人深思的是，陳映真在〈忠孝公園〉中基於中國民族

主義的批判，確實呈現了原台灣人日本兵戰爭面臨的歷史難題：爲了控訴日本政府在戰前強制台灣青年「作爲日本人而戰」，在戰後枉顧原台灣人日本兵權益的不當性，原台灣人日本兵在求償運動中必須「爭取我輩爲日本人、爲天皇赤子」，強調自己當年「作爲日本人而戰」之貢獻。前述「存日軍郵局儲金討還團」發起人黃同吉主張原台灣人日本兵是以「戰時日本人的身分，向日本政府討還戰時的欠債」，以迴避中日和約第三條「兩國政府間之特別協議」無法進行的現實局限，即爲代表性例子。然而，正如〈忠孝公園〉中「南洋戰歿台灣兵慰靈碑」揭幕儀式的場景所顯示的，原台灣人日本兵的軍服裝扮成爲時代錯誤的荒謬鬧劇，日本政軍界的出席以及「旗上血紅的旭日突兀而奪目」的海軍軍旗，也提示了原台灣人日本兵「作爲日本人而戰」的求償訴求，被日本右翼軍國主義挪用爲懷念日本殖民統治、肯定日本帝國主義戰爭的台灣人「親日」表現之危險性。前述小林善紀的漫畫《台灣論》中譯本在台灣出版引發的一連串爭議，正是殖民與戰爭責任追究捲入東亞各國國族主義、台灣統獨意識形態與政治鬥爭當中，造成台灣戰爭受害者承受新的歷史創傷之實例。

相較於原台灣人日本兵戰後因失去「日本人」身分，即使以「戰時日本人的身分」向日本政府求償也受到拒絕，美軍占領下的沖繩居民在戰後得以作爲「日本人」，獲得日本的國家傷亡撫恤與補償。然而，沖繩仍因日軍在沖繩戰期間對沖繩居民的侵害，與日本之間產生種種爭議。沖繩作家目取真俊的小說〈水滴〉即藉由沖繩居民的「身體」從戰前到戰後的受苦，呈現沖繩在地戰爭記憶受到日本國族戰爭敘事收編的歷史困境。

四、沖繩「鐵血勤皇隊」戰爭記憶之壓抑與復返： 目取真俊¹²〈水滴〉¹³

小說一開始，主角德正午覺醒來發現右腳腫脹，全身無法動彈。幾天後，當他一個人半夜獨處時，開始出現身負重傷的阿兵哥，排隊輪流喝他腳趾滴下的水。某日德正認出同鄉的戰友石嶺，他才發現這些阿兵哥就是沖繩戰時被拋棄在天然防空壕中死去的傷患士兵。當年在戰場上，身為「鐵血勤皇隊」一員的德正喝掉了從軍護士的同鄉女學生節子提供的僅剩的水，將重傷的同鄉石嶺丟棄在防空壕前不顧，自己存活了下來。

德正每年都受邀至國中小學講述自己的戰爭體驗，然而，他一直深藏他真正的戰爭體驗與記憶：拋棄同鄉石嶺，「配合著不同聽眾的需求而變換版本」（30，中譯頁107）。歷史學家海登·懷特(Hayden White)曾指出，「所有的故事都是建立在『原本有可能被納入，實際上卻被排除』的一連串事件的基礎上」，他認為取捨的基準不外乎是所有道德之根源的「社會制度」，強調故事的道德性機能。(White 1981)拋棄石嶺的戰爭經驗從德正的戰爭敘事中被「排除」，正是因為該事件與社會道德相抵觸。首先，德正放棄戰鬥行為，有辱「鐵血勤皇隊」英名；其次，他辜負同鄉女學生節子的託付，拋棄同鄉的石嶺，會受到村裡居民的批判。德正的戰爭記憶與戰時、戰後的其他集體敘事（譬如「鐵血勤皇隊」的英勇事蹟、沖繩村落共同體的緊密聯繫、戰爭體驗的傳承、捨己為人的精神）相互抵觸，不管在沖繩縣民的口述歷史、村落的地緣社會、學校的「和平教育」現場，都無法受到見證。

澤野雅樹在《記憶與重複：對歷史的提問》當中曾問道：因為

12 1960年生於沖繩縣今歸仁村，畢業於琉球大學法文學部（法律與文學學院）。歷經警衛、補習班教師等工作，現為沖繩縣立高中教師。〈水滴〉於1997年獲得「第27屆九州藝術祭文學獎」與「第117屆芥川獎」。

13 日文版刊於《文藝春秋》(1997)；中譯本刊於《聯合文學》第二一一期(2002)，頁98-116。本文採用的版本為後收錄於《水滴》(1999)之版本。

歷史而身負重傷的人們，還能待在歷史「當中」嗎？還是只能處在歷史「之外」？他進而思考，「如果說歷史當中沒有那些人的記憶容身之處，那麼，刻印在他們生命的記憶，不只是一種為歷史所扼殺、從記錄中被刪除的記憶，同時也會成為歷史的『侵蝕』、反歷史的微細顆粒」（澤野雅樹 1998：13）。德正的戰爭記憶既然被排除於「鐵血勤皇隊」等日本國族戰爭敘事之外，是否能作為沖繩居民的在地經驗，構成日本國家「歷史的『侵蝕』」、「反歷史的微細顆粒」？答案是否定的。德正背叛同鄉的節子與石嶺的戰爭記憶，不但被排除於日本的國族戰爭歷史敘事之外，同時也因為具有「侵蝕」沖繩居民共同記憶的危險性，而必須被排除於居民口述歷史的民間敘事之外。

德正無法受到「見證」的戰爭記憶，卻在半世紀之後，藉由腫脹變形的身體而「現身」。半夜負傷的阿兵哥排隊輪流來喝德正腫脹的腳滴下的水，各種感官的「身體記憶」將德正與小說敘事帶回當年的沖繩戰戰場上。德正的視覺、聽覺、觸覺等所有的感覺器官，在思考停止的狀態下，受到生存本能的驅動而異常敏感，以疼痛、飢餓、口渴等身體的受苦，記錄著他的戰爭經驗。小說中描寫，當德正無法控制地喝乾水壺中的水時，感覺到「水的粒子彷彿如玻璃碎屑一般，讓身體隱隱作痛地擴散全身」（40，中譯頁111）。液體的水被描寫為破碎後仍具有高密度的玻璃碎屑，在解除口渴苦痛的同時，也呈顯口渴的激烈程度，以強烈的身體感覺印刻在德正的記憶中。小說中另外一個「口渴」的身體體驗，出現在德正從阿兵哥鬼魂的隊伍當中，認出一個當年跟他討水喝的重傷阿兵哥時：

與那個阿兵哥相遇，是在德正要將裝了糞尿的桶子提出去時。一一甩開從左右兩排床鋪伸出來討水喝的手匆匆前進，桶緣卻被一把抓住，桶子裡的東西噴濺到某個躺著的阿兵哥臉上。德正預料將惹來一頓痛罵，怕得縮在一旁，然而對方卻沒有發出任何聲響。床位靠近出入口，在微弱的光線下可以看清楚被糞尿濺濕的那張臉。阿兵哥伸出舌頭舔舐著嘴邊的污水，纏裹胸部的繃帶急促地上下起伏著。他緩緩轉過頭來，德正知道眼窩深處的那雙眼睛正凝視著自己。大概撐不到明天了吧，德正心想。「我拿水來。」德正這樣說，繼續往前走。他終究沒能實現這個諾言。（31-32，中譯頁108）

經過半個世紀之後，德正終於藉由自己身體流出來的清水，實現了當年的諾言，讓天然壕中瀕死的阿兵哥得到最後的滋潤。「然而，他並沒有因此而得到心中的平靜，而是擔心到死前都要被那些阿兵哥鬼魂纏磨不放的恐懼感」（32，中譯頁108）。相對於沖繩在地戰爭敘事中常見的「受害者」形象，〈水滴〉當中將主角德正設定為戰場上的「加害者」，並藉由戰場鬼魂的復返現身，「再現」其受壓抑的「加害」記憶。藉由此一異於主流敘事的設定，作者目取眞俊所欲提示的，不外乎是「作為受害者的沖繩居民」之沖繩戰在地記憶與敘事，受到日本國族戰爭敘事收編之危險性。

1953年，日本宣布《戰傷病者戰歿者遺族等援護法》（1952年公布）及《恩給法》（1953年復活）適用於美軍占領下的沖繩諸島。然而，《援護法》的適用對象範圍與認定，遲至1957年才開始進行。在這之間的數年當中，沖繩發生拒絕美軍軍用地徵收運動，日本政府沒有因應沖繩的要求出面與美國交涉，而是「尋求藉由安定沖繩居民生活來支撐美國統治的途徑，其中著眼的方法之一，就是對沖繩戰犧牲者的援護」（鳥山淳 2006：385）。這樣的歷史脈絡顯示出，日本在戰後對沖繩居民進行的戰後「援護」，背後有著支撐日美安保體制的政治性考量。

同時，沖繩居民《援護法》適用之特例處理，也造成沖繩居民的戰爭經驗受到日本國族戰爭敘事收編的危機。原本在日本本國《援護法》並不適用於空襲受害者等「非戰鬥員」，在沖繩琉球政府、遺族會與教職員會的陳情運動下，原本日本本國並不適用於空襲受害者等「非戰鬥員」的《援護法》，以沖繩戰為日本國內唯一「地上戰」為理由，在適用範圍與認定以特例處理，擴大適用於以下20個項目：(1) 義勇隊(2) 直接戰鬥(3) 彈藥、食糧、患者的輸送(4) 陣地構築(5) 炊事、救護等雜役(6) 食糧提供(7) 對於四散部隊的協力(8) 防空壕的提供(9) 依據各職業範圍的協力(10) 作為區村長的協力(11) 海上避難者的獨木舟運送(12) 特殊技術者(13) 馬糧蒐集(14) 飛機場破壞(15) 集團自決(16) 帶路(17) 游擊戰協力(18) 因間諜嫌疑而被斬殺者(19) 漁撈勤務(20) 勞動服務。沖繩戰居民的《援護法》擴大適用，將日軍對沖繩居民的暴力

轉化為「戰爭協力」（譬如日軍將沖繩居民趕出防空壕成為(8)防空壕的提供）而加以合理化。同時，因為適用《援護法》的戰死者自動被合祀於靖國神社，使得沖繩居民在戰場上的受害，受到彰顯日本軍人「護國英靈」的靖國思想所收編。（嶋津与志〔大城将保〕1983：193-205）

戰後，當沖繩居民指控日軍不但沒有保護居民甚至傷害居民時，除了提出身體受苦的「受害者敘事」，並強調沖繩縣民在沖繩戰戰場上的貢獻。然而，在前述《援護法》的擴大適用過程中，「英勇而戰的沖繩縣民」受到「英勇而戰的日本國民」之國族戰爭敘事收編，使得內部的加害與被害關係與責任無法受到追究。同時，當年的日軍關係者也藉由「戰時下國民的犧牲奉獻」或戰爭的不可抗力之名，推諉戰時日軍對沖繩居民的歧視與傷害之責任，造成沖繩在與日本之間的「記憶的戰爭」當中毫無勝算。因此，目取真俊〈水滴〉當中沖繩居民德正在沖繩戰戰場「作為加害者」的記憶之壓抑與復返，不但挑戰了將沖繩「鐵血勤皇隊」的強制性軍事動員美化為「英勇而戰的日本國民」之政治神話，也對於沖繩居民的「受害者敘事」受到日本《援護法》與各府縣的慰靈碑等國族主義與軍國主義敘事收編，提出沉痛的反思與批判。

在小說當中，德正雖然試圖遺忘他在戰場上「作為加害者」的往事，表面上看起來也似乎成功了。然而，實際上他的戰爭記憶並沒有消失，而是潛藏於他身體深處的黑暗角落，正如澤野雅樹所言，「遺忘並非記憶的失落，而是測量記憶深度的一把尺」（澤野雅樹1998：33）。在毫無預警的情形下，德正的身體記憶一舉侵入他的戰後現實生活當中，讓他的右腳腫脹變形，將積蓄50年以上的能量一口氣釋放出來。然而，具有強大力量的身體記憶，卻是緘默的而非饒舌的，「你可以感覺到身體記憶的密度，感受到它的沉甸甸、不透明、出沒無常、說不清楚。彷彿是因為它的濃密，因為它根植於活著的身軀那紮實厚重的觸感，使得它緘默(mute)了」（Casey 1987: 165）。身體記憶根植於活著的肉身觸感，具有紮實的密度與深度，當它無法找到適合的表現語言時，便選擇了緘默，盤據在當事者生命的邊緣地帶。德

正無法被訴說與見證的戰爭記憶，作為身體記憶，藉由身體的變形而現身。雖然這樣的身體記憶沒有語言，或者應該說，正因為它沒有語言，得以在語言所堆砌起來的世界中央鑽出一條裂縫，動搖了表面上平靜的「戰後」世界。

在小說當中，「身體」不但成為召喚德正「作為加害者」的戰爭記憶復返之媒介，藉由身體的扭曲、「再生」與原形畢露，沖繩戰的過往記憶與當下沖繩的政治現實也產生了具體的連續性。小說前半部解除沖繩戰場上阿兵哥口渴的水，到了小說後半部，成為具有回春效果的「奇蹟之水」，帶出另一段身體再生與受苦之故事。德正遊手好閒的表哥清裕無意間發現，德正右腳滴下的清水具有回春效果，可以壯陽、治療禿頭、皺紋與老化，便將水收集起來以高價販售，賺進大把鈔票。然而，某日德正突然恢復意識，右腳回復原來大小且停止滴水，使用了「奇蹟之水」的男女都毛髮脫落，成了布滿斑斑黴點的老人臉，群聚毆打清裕洩憤。

不只有戰時的身體遭受扭曲蹂躪，戰後沖繩的身體也在「再生」神話崩解之後，呈現敗壞的真實面貌。戰後盤據於沖繩正中央的美軍基地，是由日本政府出錢向沖繩居民租借土地，並藉由「經濟振興方案」的大量補助金，來安撫居民對於美軍基地造成的種種傷害之不滿情緒。在經濟上無法自給自足的沖繩經濟，只能仰賴美軍基地帶來的收入及日本政府的補助金，使得經濟的施惠成為美日政府與沖繩交涉的籌碼。

2000年G8高峰會議在沖繩舉行，從會議期間美國總統柯林頓的演講內容來看，出動美國總統安撫沖繩縣民人心以鞏固美日共同防衛體系，可說是高峰會議主要的戲碼。配合此次高峰會議，日本發行新的2,000日圓紙鈔作為紀念，正面圖案採用沖繩最具代表性的建築物——琉球王國的「守禮門」，背面則是象徵日本傳統文化的「源氏物語」繪卷之一。山城雅延援引人類學當中「贈與」的概念，分析此一沒有任何實際利益的「贈與」背後的政治意涵：「不管是『近代化』或是『經濟振興方案』，凡是帶有暴力的『贈與』，通常內含了『償還』的要求，且強烈暗示祭壇與供品的形象」（山城雅延 2000：10）。接受

「贈與」的沖繩在政治文化層面付出相對的代價，成為日美安保體制政治祭壇上的供品，然而，很快就發現經濟上的「贈與」並不能讓沖繩「再生」，只是不斷掩飾沖繩因美軍基地而扭曲的經濟與社會結構。

不僅如此，戰後沖繩美軍基地的存在，對於當年沖繩戰的喪生者、倖存者，以及沖繩戰經驗衍生出來的戰後「和平」思想與教育，不啻是最大的諷刺。越戰期間美軍以沖繩的基地為中繼點，送出一批又一批美國士兵上越戰戰場。幾乎是不歸路的越南叢林戰就在眼前，自暴自棄的美國大兵將大筆軍餉揮灑在沖繩的夜生活酒色。沖繩發了戰爭財，也間接協助了美軍對越南的戰事，飽受沖繩飛來的美軍轟炸機之苦的越南居民，將沖繩稱為「惡魔之島」。¹⁴在〈水滴〉當中，「滋潤」戰後沖繩荒蕪社會的美軍基地與日本「經濟振興方案」，就像是德正腫脹變形的右腳滴下的「奇蹟之水」，只能短暫造成「再生」的效果，失效後靠它回春的男女瞬間呈現比原來狀況更糟的老態，暴露出欺瞞與傷害本質。

小說最後，怪病痊癒的德正前往探望被打得遍體鱗傷的清裕，受到在場的酒友一邀，又開始喝酒賭博。隔天早晨在自家門口醒來的德正決心明天開始下田工作，想除除雜草作為暖身，卻在高及腰部的漫草中發現一顆比他雙手環抱還大的巨無霸冬瓜，原來是他生病時右腳滴下的「奇蹟之水」滋潤下長成的。「濃綠的瓜皮上，細毛閃閃發光。德正喟然一嘆。輕輕踢了一下，冬瓜紋風不動。冬瓜那拇指粗的藤蔓一直蔓延到朱槿樹叢裡。綿延伸展的藤蔓尾端，嫩黃的花朵在藍天中隨風搖擺。花朵的絢爛，讓德正不禁濕了眼眶」（49-50，中譯頁114）。

1997年〈水滴〉獲得芥川獎之後，目取真俊在沖繩報紙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戰爭結束後，沖繩各地都傳出採收到巨無霸冬瓜及南瓜的消息。據說是因為戰爭時喪生的人橫屍於農作物根部，屍體腐爛後

14 美軍遭受9/11恐怖攻擊之後、攻打伊拉克期間，沖繩的觀光生意大受影響，只有在美軍發動對外戰爭時，日本人才會意識到沖繩除了有療癒現代人的美麗南島風光與熱情民風之外，還有遠東最大的美軍基地存在。

成爲養分。以這些巨無霸冬瓜、南瓜爲食，戰爭倖存者熬過戰後食糧短缺的日子」（目取眞俊 1997/07/24）。戰後初期，沖繩戰的倖存者以戰死者的屍體爲養分長成的巨無霸瓜類，勉強維持生命。〈水滴〉當中完全沒有提及沖繩與美軍基地共生的戰後現實，然而，正如小說結尾的巨無霸冬瓜所寓示的，戰後沖繩半個世紀以來在經濟上仰賴美軍基地與日本政府補助金，忍受美軍基地帶來的人權侵犯，不但無法對戰死者進行真正的「慰靈」，沖繩也因此無法真正進入「戰後」。¹⁵

五、擾亂國族戰爭敘事的「非國家」身體

綜合本文的討論，在戰後東亞「記憶的戰爭」中，台灣與沖繩分別有著不同的發言位置：台灣人「曾經是，但現在已經不是」日本人，沖繩居民則「現在仍是」日本人（1972年回歸日本之後）。戰後國族身分與發言位置的差異，影響了本文討論的三篇小說召喚戰爭記憶、反思台灣與沖繩「作爲戰後的現在」之方式。宋澤萊〈最後的一場戰爭〉彰顯原台灣人日本兵求償運動的歷史使命及任重道遠，卻沒有預料到會因台灣人在戰後「不具日本國籍」與「日台斷交」，無法獲得「作爲日本人」的權益。陳映眞〈忠孝公園〉發表於2000年政黨輪替後，基於中國民族主義觀點，批判原台灣人日本兵求償運動淪爲美化日本軍國主義的「親日」表現。目取眞俊〈水滴〉中德正「作爲加害者」的戰場罪疚，使得沖繩居民作爲「英勇而戰的日本國民」之國族戰爭敘事產生裂痕，並批判沖繩容忍美軍基地的「戰後」政治現況。

雖然有著國族身分與發言位置的差異，原台灣人日本兵與沖繩居民的共通處在於，在與日本的戰爭與戰後責任爭議中，都必須強調自己在戰爭期間如何「作爲日本人而戰」，使得他們在二戰期間身體

15 目取眞俊在2005年出版的評論集即以《沖繩「戰後」零年》爲標題，強烈批判在「戰後」60年的現在，沖繩仍然忍受著「日美安保體制」下美軍基地帶來的傷害，以及日本國族主義對二戰戰爭記憶的收編與責任迴避，「戰後」其實還沒有開始。

受苦的戰爭體驗與記憶，面臨被日本國族敘事收編的危機。因此，台灣與沖繩的二戰戰爭敘事如果不將「作為日本人而戰」的「身體」加以問題化，以國族之名加諸身體的暴力只會有增無減，在想像力劃地自限的情況下，「歷史」的其他可能性也就無從開啓了。這也是為什麼以國族為單位裁定戰爭與戰後責任，或是分析國民的身體如何被總動員投入戰爭的行列（日本有許多相關研究），即使本意是要譴責以「國族」之名發動的「戰爭」，但因將「戰爭」、「身體」與「國族」的單一對應關係視為不證自明，反倒會違反本意地再生產、再強化三者之間的共犯關係。

事實上，原台灣人日本兵與沖繩居民作為國族身分複雜的歷史存在，本身即具有將「作為日本人而戰」的「國民身體」加以問題化之潛在可能性。「原台灣人日本兵」名稱中民族（台灣人）與軍隊國籍（日本兵）的不一致、「原」標示的國族身分轉變、「沖繩居民」以其地方殊異性抵抗「日本國民」國族範疇收編的可能與局限，他們在國族身分議題上的複雜性與爭議性，雖造成難以承受與突破的歷史困境，卻也潛藏了將歷史悲情轉化為歷史能動性之可能：作為國族身分「矛盾」與「錯亂」之歷史主體，擾亂「身體」、「國族」與「戰爭」的單一對應關係與邏輯，多重挑戰東亞的國族戰爭敘事與記憶政治學。

〈最後的一場戰爭〉中以「日本皇民」身分「送死」的台灣人青年、為了戰後受日本與台灣政府忽視的台灣人同胞打「最後的一場戰爭」的福壽；〈忠孝公園〉「南洋戰歿台灣兵慰靈碑」揭幕儀式中「老態龍鍾、疲乏不堪的『軍容』」呈現的時代錯亂身體、用日語哭嚎著「我到底，是誰呀——」的林標；〈水滴〉中有損「鐵血勤皇隊」英名的德正、「加害者」的身體記憶在「戰後」之壓抑與復返。在本文討論的三篇小說當中，原台灣人日本兵與沖繩居民矛盾與錯亂的身體從戰前、戰爭期間至戰後的受苦、毀滅與倖存，以及這些身體在日本與台灣國族敘事中的緘默、饒舌與雜音，可協助我們進一步探討台灣與沖繩作為「非國家」，與東亞國家意識形態與暴力相對抗的文化可能性。同時，這些「非國家」身體挑戰東亞國族敘事的歷史能

動性，也開啓了戰前被迫「作為日本人而戰」的原台灣人日本兵、戰後成為美軍基地「惡魔之島」的沖繩居民超越國族身分界線，與其他國家的弱勢族裔人民「共有」戰爭的歷史經驗與創傷記憶，連帶抵抗以國族之名遂行的戰爭與「戰後」暴力之可能性。¹⁶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 目取眞俊著，朱惠足譯。2002。〈水滴〉，《聯合文學》第二一一期（2002年5月號），頁98-116。
- 宋澤萊。1984。〈靈魂的搏動：從廖偉竣到宋澤萊的變奏和迴響〉，收錄於《台灣作家印象記》，頁272-273。台北：眾文圖書公司。
- 。1988。〈最後的一場戰爭〉，收錄於《等待燈籠花開時》，頁147-196。台北：前衛出版社。
- 李展平。2007。《戰火紋身的監視員：台籍戰俘悲歌》。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
- 李國生。1997。《戰爭與台灣人：殖民政府對台灣的軍事人力動員（1937-1945）》。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林志剛。1994a。〈人權的演繹：原台灣人日本兵戰後求償事件記要及展望（上）〉，《律師通訊》第一七二期，頁39-42。
- 。1994b。〈人權的演繹：原台灣人日本兵戰後求償事件記要及展望

16 不僅止於亞洲內部，藉由「非國家」身體挑戰國族戰爭敘事的實踐，也可與世界各國弱勢族裔軍事動員的議題互相連結。例如酒井直樹曾透過陳火泉〈道〉、王昶雄〈奔流〉中皇民化時期的台灣人知識分子、岡田約翰(John Okada)《不不男孩》(*No-No Boy*)中拒絕國家兵役徵召的日裔美國人，討論帝國國族主義如何透過「種的邏輯」與國族主體的管理技術，試圖使「受盡屈辱的弱勢成員將國家內部的攻擊性，置換並外化於國家外部代罪的假想敵，藉此重獲他們的名譽與自尊」，以及被殖民者或弱勢族裔對此國族主義召喚的抵抗與回應。（酒井直樹2006）

(下)》，《律師通訊》第一七三期，頁25-29。

郝譽翔。2001。〈永遠的薛西弗斯：陳映真訪談錄〉，《聯合文學》十七卷九期（2001年7月），頁26-31。

酒井直樹著，朱惠足譯。2006。〈兩個否定：遭受排除的恐懼與自重的邏輯〉，收錄於《文化的視覺系統 I：帝國—亞洲—主體性》，劉紀蕙主編，頁259-297。台北：麥田出版。

陳建忠。2003。〈末日啓示錄：論陳映真小說中的記憶政治〉，《中外文學》三十二卷四期（2003年9月），頁134-137。

——。2007。《走向激進之愛：宋澤萊小說研究》。台中：晨星。

陳映真。2001。〈忠孝公園〉，收錄於《忠孝公園》，頁125-229。台北：洪範出版社。

劉本炎。1975。〈台灣同胞向日本討還軍郵儲金的面面觀〉，《法律世界》第四期（1975年4月），頁39-46。

鄭麗玲。1994。〈不沉的航空母艦〉，《台灣風物》四十四卷三期（1994年9月），頁51-89。

二、日文書目

大宅壯一。1959。〈忠誠あまりにも忠誠〉（忠誠，太過忠誠），《文芸春秋》（1959年9月號），頁62-71。

山城雅延。2000。〈二〇〇〇円札の『裏』側〉（兩千元紙鈔的「背」後），《Edge》9、10合併號（2000spring），頁8-11。

目取真俊。1999。〈水滴〉，收錄於《水滴》，頁7-50。東京：文藝春秋。

近藤正己。1988。〈異民族に対する軍事動員と皇民化政策—台湾の軍夫を中心にして—〉（日本對異族——台灣軍夫——的軍事動員與皇民化政策），《台湾近現代史研究》第六號（1988年10月），頁115-164。

鳥山淳。2006。〈沖繩戦をめぐる聞き書きの登場〉（沖繩戰口述歷史的登場），收錄於《岩波講座アジア・太平洋戦争6：日常生活の中の総力戦》（岩波講座亞洲・太平洋戦争6：日常生活中的總動員），頁381-406。東京：岩波書店。

新崎盛暉。1992。《沖繩同時代史一：1973-1977》。東京：凱風社。

澤野雅樹。1998。《記憶と反復—歴史への問い》（記憶與重複：對歷史的質問）。東京：青土社。

嶋津与志（大城将保）。1983。《沖繩戦を考える》（思考沖繩戦）。沖繩：ひるぎ社。

三、英文書目

Casey, Edward S. 1987. *Remembering: A Phenomenological Study*.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White, Hayden. 1981. "The Narrativization of Real Events," in *On Narrative*, edited by W. J. T. Mitchell, pp. 249-254.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四、報刊資料

目取真俊。1997/07/24。《沖繩タイムズ》（沖繩時報），日報第一版。